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外壁追刻龕及窟前建筑的考古学观察

黄盼

关键词：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 追刻龕 窟前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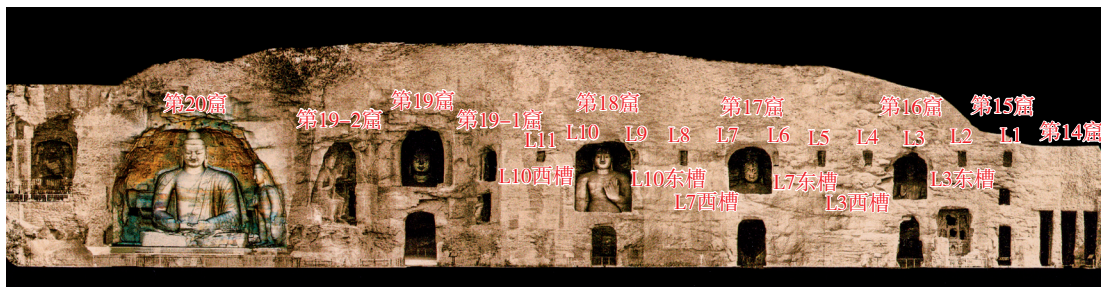
KEYWORDS: Yungang Grottoes Tanyao Five Caves Later-added Niches Structures in Front of the Caves

ABSTRACT: The exterior walls, windows, and areas flanking the entrances of the Tanyao Five Caves are densely covered with later-added carvings of a thousand Buddhas, among which small niches and traces related to structures originally built in front of the caves are interspersed. By analyzing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s such as cuts and avoidances between these remains, this study clearly establishes that after the initial excavation of the Tanyao Five Caves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two distinct,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undertaken on their exterior walls: the erection of structures in front of the caves and the carving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ve-front structures was an imperial project, which had already commenced by the 13th year of the Taihe era (489 CE). The thousand Buddhas project, however, was funded collectively and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17th and 19th years of the Taihe era (493–495 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imperial Northern Wei caves demonstrates flexibility in development, representing a practice of state-sponsored Buddhism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云冈石窟开凿洞窟的山体崖壁被两条天然冲沟分割为三个片区，东区主要洞窟为第1—4窟，中区为第5—13窟，西区为第14—45窟。西区崖壁以第20窟为界，以西集中分布着中小型洞窟，以东的第16—20窟规模宏大，洞窟内的主要空间被巨大佛像占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公元460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

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1]。一般将西区的第16—20窟比定为昙曜五窟，是由北魏文成帝出资营造的皇家洞窟。目前第14—20窟所在的西区东部外壁面整体布满追刻千佛小龕，这些千佛龕一直延伸至洞窟的明窗、门口两侧甚至窟内的空白壁面，其中也夹杂着部分小佛龕。此外，该区域的外壁面及洞窟明窗两侧还分布着与不同时期窟前建筑相关

作者：黄盼，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云冈西区东部洞窟及窟前建筑梁孔位置

(引自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二), 彩版三一五-1)

的大小梁孔。通过对窟前遗址的发掘确认第14—20窟前9.39—10.62米处东西排列着23个大柱穴,为北魏时期窟前建筑相关遗迹。大柱穴对应位置的第14—18窟外壁可见11个纵长方形大型梁孔。梁孔在第16—18窟明窗处部分或完全架空,从壁面保留的槽孔及凿痕可看出在这些梁孔之下应架有用以支撑的结构^[2](图一)。

对于这些遗迹现象的性质及形成时间,学界有较多探讨。杭侃认为外壁统一雕刻的千佛龕可能是昙曜的原始设计,是迁都洛阳前皇家工程的最后一环^[3]。秉承这一观点,稻本泰生对昙曜五窟的整体工程进行探讨,将明窗、拱门附近的小龕与千佛视为两次工程,由于小龕中第17窟明窗有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比丘尼惠定为自己所造的龕像,所以小龕是太和十三年左右营造的非皇家工程。而周边的千佛未打破太和十三年龕,因此皇家工程的千佛不早于太和十三年,但可能有较长的施工期^[4]。冈村秀典认为第17窟明窗在架梁后很难再雕刻佛龕,梁孔应与佛龕基本同时期,而第14—20窟窟前建筑的营造应紧接公元489年^[5]。彭明浩则认为西区窟檐建筑不晚于壁面千佛龕的营建,

二者可能是统一工程并同时施工,是迁都后由僧团主导^[6]。通过以上观点,可看出西区东部外壁面追刻佛龕的时间与窟前建筑及昙曜五窟的营造工程密不可分。既往研究都观察到部分遗迹间的避让打破关系,但并未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首先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古学观察,系统分析佛龕之间的打破、避让等关系,对追刻龕进行分期。再通过佛龕中可显示时间的关键性要素,判断各期的具体时间。最后对窟前建筑及千佛工程的营造时间、工程性质进行探讨。

一、追刻龕的分布规律及分期

追刻千佛龕造型统一,均为圆拱龕,龕中为一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佛,着衣以通肩式为主,部分为覆肩袒右式。分布在昙曜五窟的外壁、明窗两侧及门口两侧,甚至侵入窟内。第19-2窟右半部分已坍塌,现存洞窟内外布满追刻千佛龕,可看出大面积雕刻千佛龕时的分布特点,所以首先对其进行分析。在了解千佛龕分布规律后,再对昙曜五窟明窗及门口处的追刻龕进行观察(附表)。文中使用的佛龕编号均出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7],建筑

遗迹编号出自《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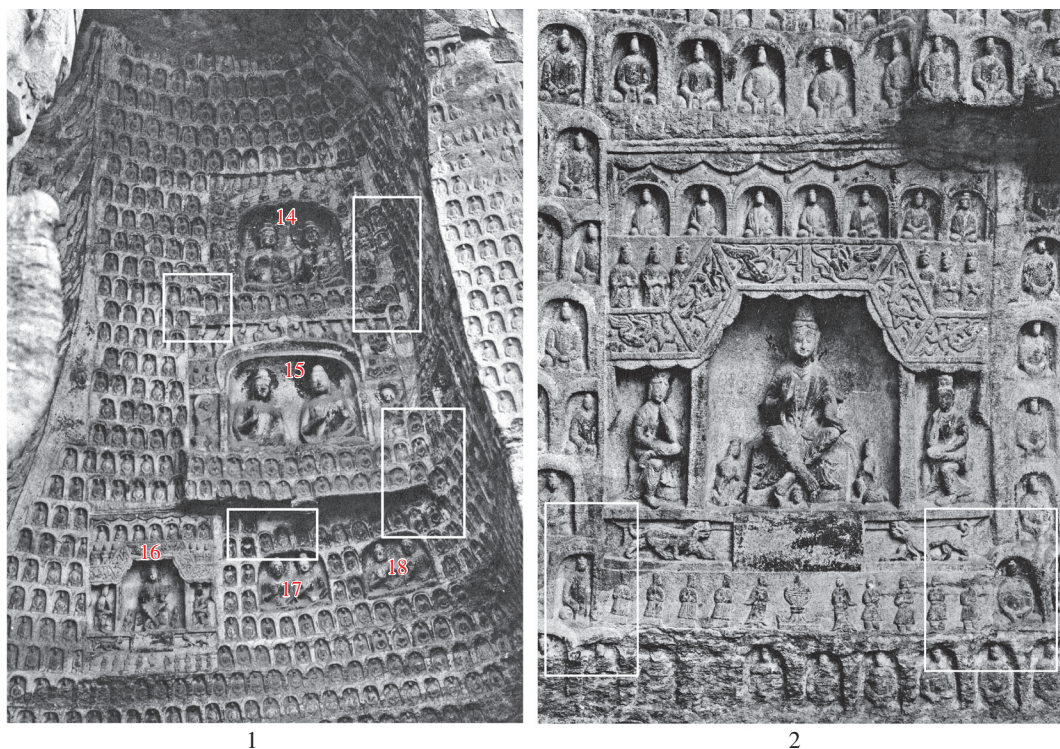
(一) 第19-2窟

第19-2窟内左壁上半部分零散分布五龕(龕14—18)，千佛在龕14、15之间打破规则的行列插入一行，龕14左侧与前壁之间的空白处无规律的雕刻着两个千佛，龕17、18除造像之外的结构均被刻成千佛，龕17上方千佛甚至呈弧线排列，仅龕16附近千佛行列规整(图二，1)。龕16左右下角千佛雕刻方式不同，右侧千佛龕内佛像仅雕刻三分之二，保证龕16外框的完整；左侧千佛龕则雕刻出完整佛像，并一直侵入龕16内(图二，2)。两侧处理方式不同，但明显相互协调、同步施工。

第19-2窟内前壁下部零散分布七龕，即龕8—13及龕9右侧未编号毛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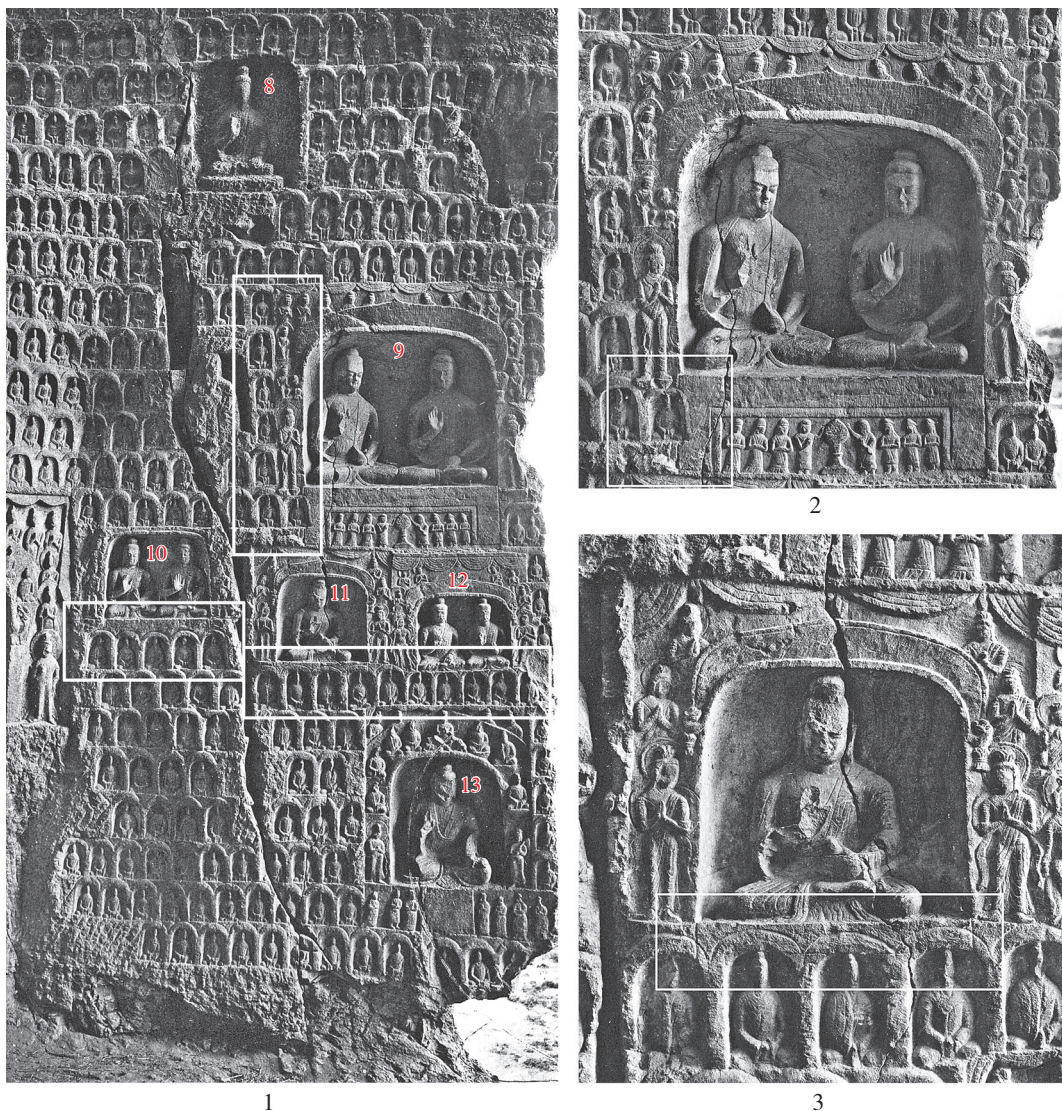
(图三，1)，其中龕8、10未完成，拱额部分被刻为千佛。龕10下部尚存部分四脚座的刻线。龕9的外框线被千佛龕侵蚀，周围千佛龕大小不一，是在毛坯像与该龕之间的空白处插入千佛龕的结果。此外，该龕四脚座右脚的外侧刻线被千佛龕打破，该千佛龕略小、未雕刻完整拱额，胁侍菩萨右肩处的千佛龕为同样状态(图三，2)。龕11、12位置关系紧密，相互避让同时施工，龕11下部的四脚座被追刻为千佛，千佛龕拱额尚可见四脚座的部分刻线(图三，3)。龕12下方无台座无铭区，有一列龕额不完整的千佛龕，应是插空雕刻。仅龕13周围千佛行列规整，该龕与千佛同时施工。

第19-2窟右壁、明窗门口之间均已坍塌，明窗左侧刻满千佛龕，门口左侧



图二 第19-2窟左壁佛龕14—18

1.龕14—18 2.龕16(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三卷図版、pl.117、pl.122)



图三 第19-2窟前壁佛龕8—13

1. 龕8—13 2. 龕9 3. 龕11 (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十三卷図版、pl.109、pl.111、pl.114)

雕刻千佛及一座结构复杂的组合佛龕。该龕上下千佛排列规整，千佛行还与外壁基本相连，可看出该龕应与千佛同步施工，并按照千佛的行列规划了佛龕的大小、位置（图四）。

此外，也存在晚于千佛的追刻小龕，如主尊左侧的龕23、24。龕24外侧千佛按照主尊背光外轮廓排列，佛龕是削掉主尊背光火焰纹之后的追刻，打破了主尊背光。龕23的雕刻平面低于旁边

供养人及千佛的雕刻平面，亦是削掉原始雕刻之后进行的追刻。龕23与千佛之间有一定空白，千佛应是按照原始雕刻位置排列，追刻龕可能削掉了末尾的供养人像（图五；图六）。龕23带有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纪年，证明千佛完成于公元515年之前。

千佛小龕几乎填补了第19-2窟壁面所有的剩余空间，行列规整。营造千佛的同时，也雕刻了一批小龕，它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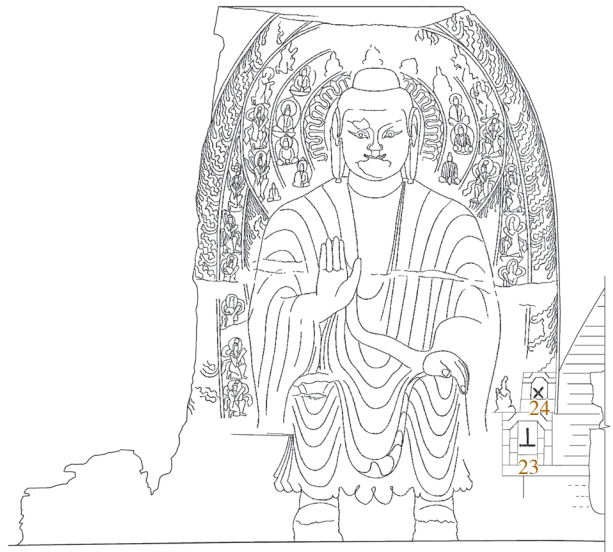


图四 第19-2窟门口左壁佛龕（笔者拍摄）



图五 第19-2窟佛龕23、24
（引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雲岡石窟 第二十卷 第十七窟—第四十一窟』图版、pl.130）

位置是在考虑周围千佛龕排列的情况下雕刻，二者相互调和，具有规划性。在同一平面上有早于千佛的小龕，这些小



图六 第19-2窟佛龕23、24位置
（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三卷·第十四卷本文、第27頁、第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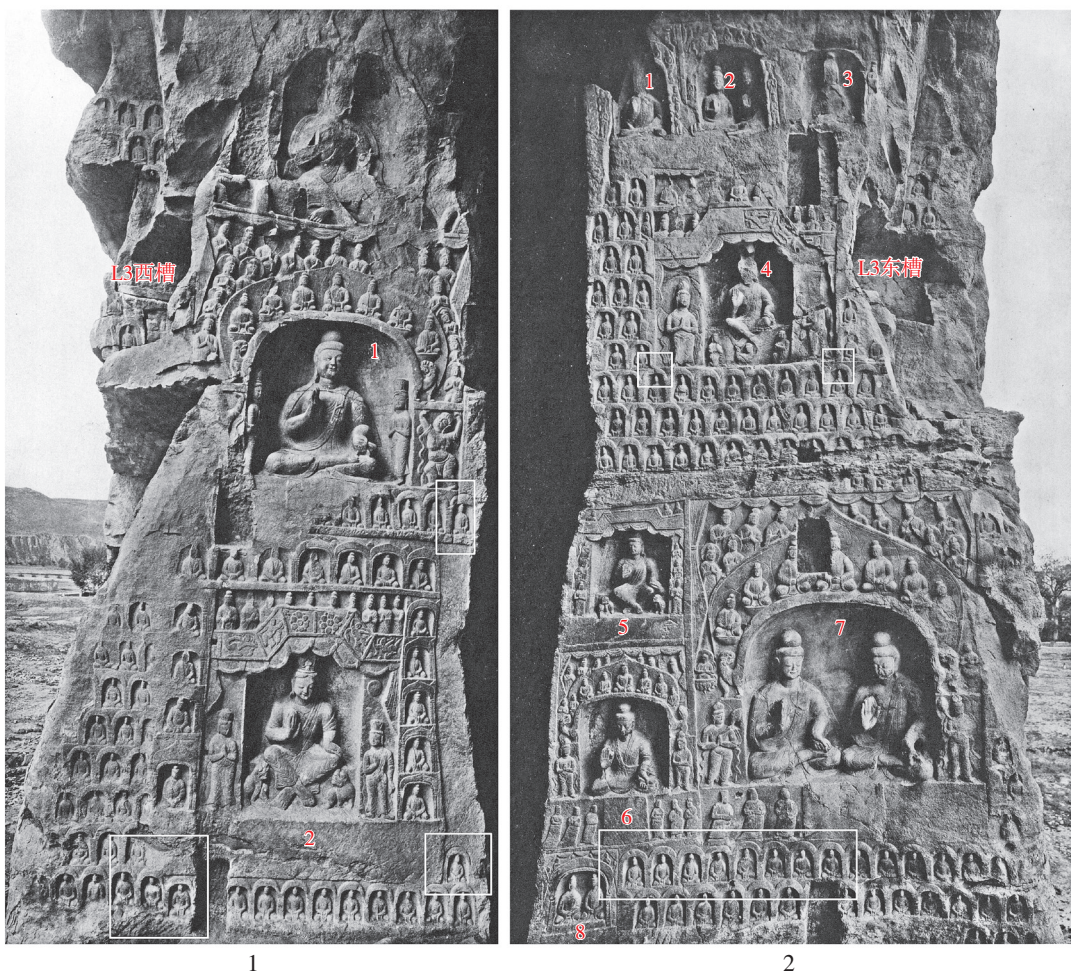
龕附近的千佛排列不规整，并可能被千佛打破边框、龕楣、铭区等位置。此外，还有晚于千佛的追刻龕，这些龕会削掉洞窟中的原有雕刻，低于千佛的雕刻面。

(二) 第16—18窟明窗

第16—18窟明窗追刻有大量千佛龕及佛龕，且殘存窟前建築相關遺迹，而門口兩側千佛龕較少，無法看出明確的層位關係，故僅對三窟明窗的追刻龕進行考察。

第16窟明窗右壁有兩龕，龕1由上下並列的兩龕組成，上龕大部分損毀，下龕下部銘區左側的外框線尚保存在千佛龕上，可見追刻的千佛龕打破龕1下方銘區及外框線，該龕早於千佛（圖七，1）。龕2周圍千佛龕排列不規整，應是插空排列，故龕1、龕2均早於千佛。明

窗左壁可見八龕，其中龕1—3位於最上層，周圍無千佛，龕1右側留有部分空白壁面，與右壁龕1、2相同，三龕可能早於千佛。龕4下方的千佛龕上仍保存佛龕的外框線，可知該龕早於千佛。龕5—7位置關係緊密、互不衝突，應為同時期施工，三龕外的千佛排列不規整，應是插空雕刻，三龕也早於千佛。下方龕8的二佛均施禪定印，與其他佛龕不同，但造型接近千佛，正好占據兩行千佛的空間，應與千佛同時期開鑿。除近似千佛造型的龕8外，各龕均早於千佛（圖七，2）。按照窟前柱洞及外壁梁孔的分布規



1

2

图七 第16窟明窗两侧壁佛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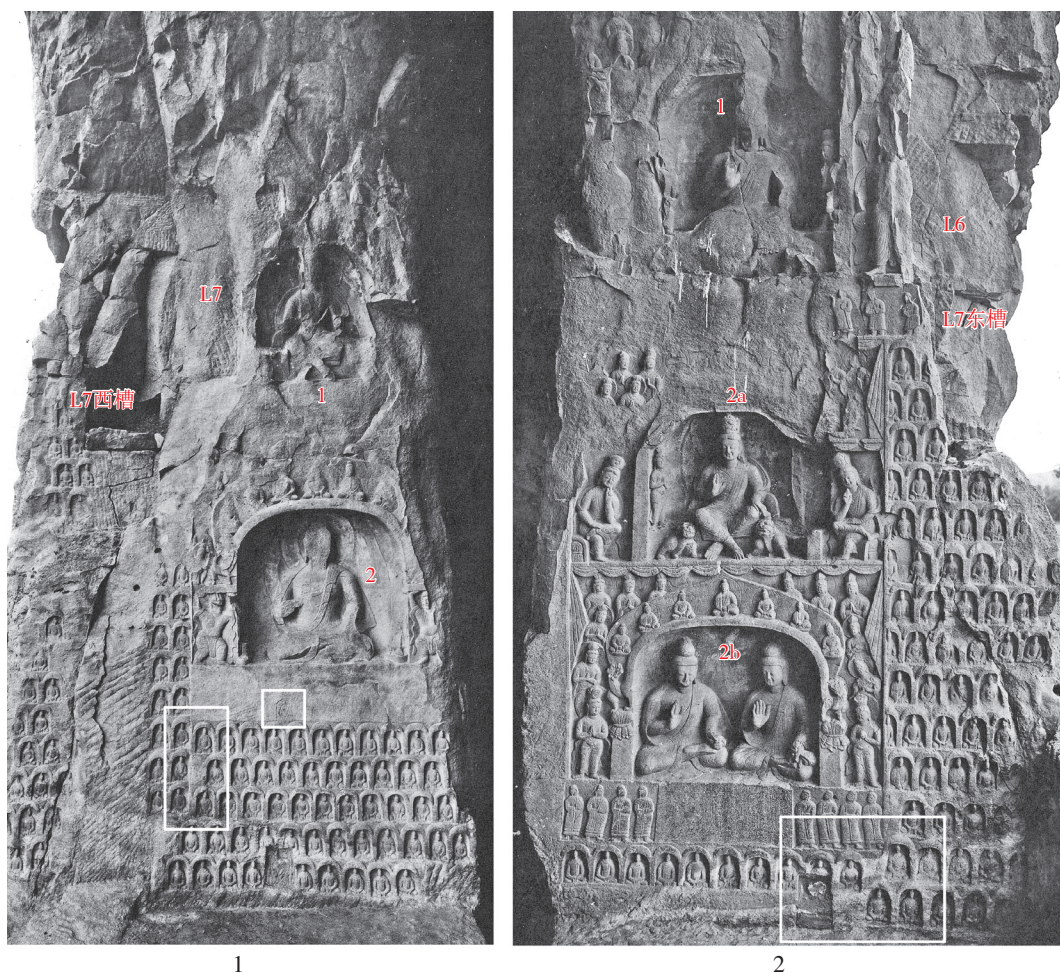
1.右壁 2.左壁（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十一卷図版、pl.54、pl.49）

律，第16窟明窗处的梁孔L3处于半架空的状态，明窗两侧壁均凿出槽孔架东西向横梁用于支撑。千佛避让早期佛龕的同时也避让了槽孔。

第17窟明窗右壁有两龕，龕1主尊为交脚菩萨，风化严重；龕2与龕1相接，下部千佛排列不规整，在佛龕下部空白的铭区还有一个仅刻线未进一步雕刻的千佛小龕（图八，1）。明窗左壁有两龕，龕1主尊为交脚菩萨，风化严重，高度与右壁对应；龕2与龕1相连、宽度较窄，由上下并列的两龕组成，带有太和十三年铭文，下部千佛排列不规整

（图八，2）。上述四龕应均早于千佛。由于部分壁面的坍塌，外壁梁孔在第17窟明窗附近可见两处（L6、L7），均位于上层交脚菩萨龕外侧。其中L7半架空，两侧壁可见横梁槽孔。L7西槽下方有一列纵向带有凿刻痕迹的空白壁面，千佛在其两侧分布，并且空白壁面外侧千佛的外框未雕刻完整，千佛对空白壁面的避让，表明千佛在雕刻时此处已存在立柱等建筑相关结构，无法进行雕刻，即千佛插空雕刻，晚于窟前建筑。

第18窟明窗右壁有三龕，千佛在龕1、3周围行列规整，在龕2周边分布不规



图八 第17窟明窗两侧壁佛龕

1.右壁 2.左壁（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pl.11、pl.10）

整。龕1下方的供养人明显避让了龕2，所以龕1、3与千佛同时，龕2早于千佛（图九，1）。明窗左壁有四龕（龕1、2、3a、3b），龕3a与3b虽各自有供养人，但龕上方的帐形装饰相通，又与上方龕1、2相连，位置关系紧密，应为同时制作（图九，2）。外壁梁孔在第18窟明窗附近有两处（L9、L10），左壁由于坍塌，可直接看到梁孔L9，西侧L10完全架空。明窗两侧壁对应位置均可见横梁槽孔（L10东槽、西槽），L10东槽附近夹在佛龕和槽孔之间的千佛行列调整了位置，所以明窗左壁四龕及槽孔应均早于千佛。



图九 第18窟明窗两侧壁佛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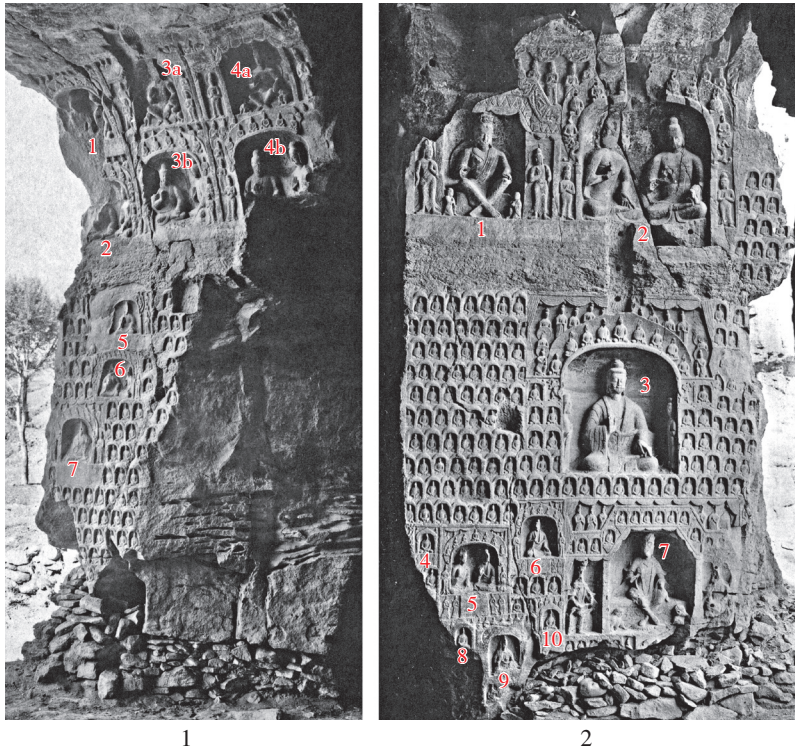
1.右壁 2.左壁（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pl.87、pl.81）

（三）第19、19-1窟门口

第19窟及二胁窟的开凿位置深于其他四窟，与地面柱穴对应位置没有崖面，但在对应位置的地面雕刻柱穴，立柱以支撑梁架。第19、19-1窟明窗刻满千佛，无单独小龕。二窟门口有大量规整的千佛龕及小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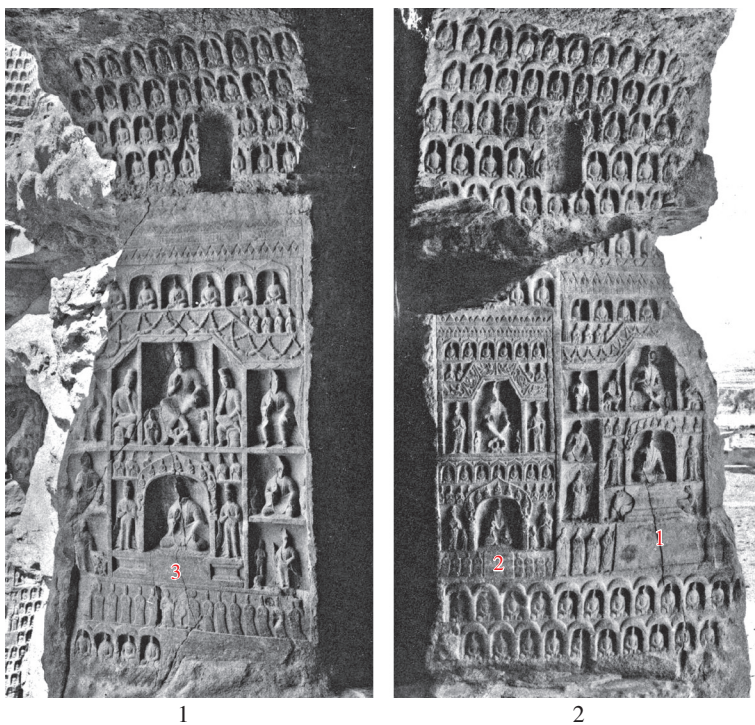
第19窟门口两侧不对称，右壁有弧度，左壁与顶部基本垂直。门口右壁最上层六龕（龕1、2、3a、3b、4a、4b）周围无千佛。其中龕1有单独铭区，龕3a

与3b、龕4a与4b分别上下重叠，可能为组合龕。六龕下方隔一层空白壁面，为三个被千佛包围的小龕（龕5—7），周围千佛规律排列。其中龕6右侧胁侍菩萨姿态局促，与右侧千佛紧密相接；龕7左胁侍菩萨的头光与左侧千佛紧密相接，应是相互避让协同施工（图一〇，1）。门口左壁最上层有大小一致的两龕（龕1、2），龕上方有连通的帷幕，



图一〇 第19窟门口两侧壁佛龕

1.右壁 2.左壁（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三卷図版、pl.3、pl.2）



图一一 第19-1窟门口两侧壁佛龕

1.右壁 2.左壁（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三卷図版、pl.65B、pl.65A）

可知关系密切，应为同时施工。两龕左侧的空白壁面不规则地追刻有千佛龕。龕1、2下方隔着一层空白壁面，为被千佛龕包围的龕3。龕3雕刻的起始高度与千佛相同，占据9行千佛的空间，周围千佛排列规整。龕3下方为紧密排列的龕4—10，其中龕6、7上缘高度一致，与龕3间隔一行千佛，龕6的右上角未雕刻帷幕，雕刻了完整的千佛龕，二者无打破关系，而是相互避让、同时施工（图一〇，2）。上层的龕1、2早于千佛，下部的龕3—10与千佛同时，其中龕4、8、10是与千佛近似的禅定小坐佛。

第19-1窟门口两侧壁共三龕，左壁龕1与右壁龕3均为结构复杂的组合佛龕，造型接近；左壁龕2为上下两龕的组合。左壁龕1、2两龕周围千佛龕排列规则，两龕应均与千佛同时。右壁龕3上方与千佛之间隔有一段空白壁面，从窟内外来看，该处有一层脆弱的岩层，佛龕与千佛小龕均对其进行了避让（图一一）。佛龕下方虽仅雕刻四个千佛小龕，但

可知关系密切，应为同时施工。两龕左侧的空白壁面不规则地追刻有千佛龕。龕1、2下方隔着一层空白壁面，为被千佛龕包围的龕3。龕3雕刻的起始高度与千佛相同，占据9行千佛的空间，周围千佛排列规整。龕3下方为紧密排列的龕4—10，其中龕6、7上缘高度一致，与龕3间隔一行千佛，龕6的右上角未雕刻帷幕，雕刻了完整的千佛龕，二者无打破关系，而是相互避让、同时施工（图一〇，2）。上层的龕1、2早于千佛，下部的龕3—10与千佛同时，其中龕4、8、10是与千佛近似的禅定小坐佛。

行列规整，参考左壁佛龕的情况，右壁龕3与千佛同时的可能性较大。

（四）小结

通过佛龕的布局及打破、避让关系，明确昙曜五窟明窗及门口的追刻龕存在早于千佛的小龕及与千佛同时的小龕。前者位置不定，常常出现在明窗等高处，周围千佛排列不规整，部分边框、铭区被千佛打破，施工时并未考虑到千佛的营造；而后者具有规划性，与千佛协同雕刻。二者并非单纯的工序问题，而是可以分为两期，即早于千佛的小龕为第一期，千佛及与其同步营造的小龕为第二期。此外，第二期小龕中千佛避让第一期小龕的同时亦避让了窟前建筑相关遗迹，所以窟前建筑的营造早于第二期小龕。

从主尊的着衣来看，第一期小龕中佛着衣以袒右为主，主尊交脚菩萨着衣以斜披络腋为主，但已出现上衣搭肘、交叉披帛等汉化的着衣表现。而第二期除千佛及部分与千佛造型接近的小龕外，已均为汉化着衣，所以部分位于高处与千佛没有直接位置关系的非汉化样式主尊小龕应属第一期（见附表）。

二、两期佛龕的营造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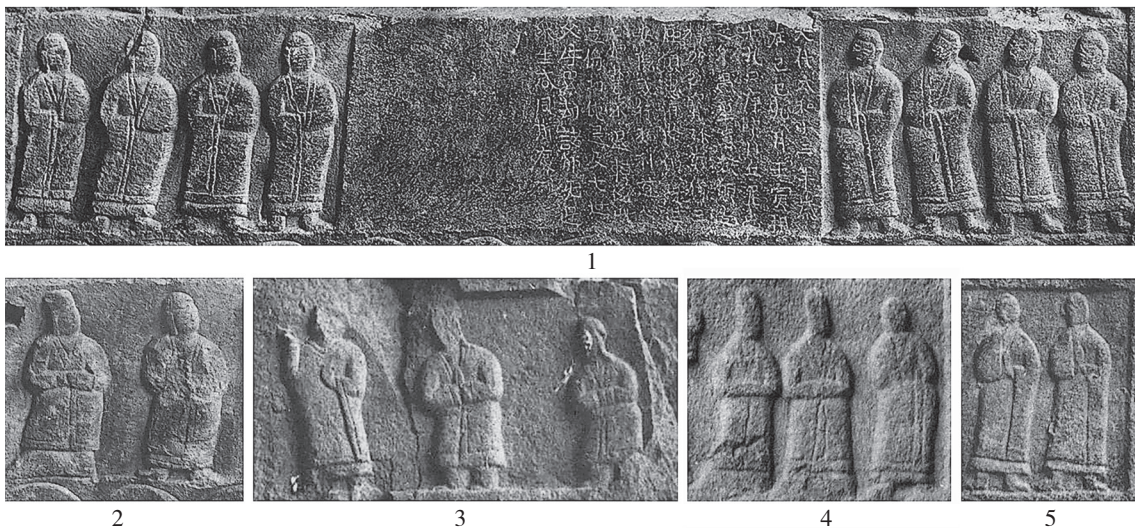
上文通过佛龕间的打破、避让关系判断昙曜五窟明窗、门口雕刻于同一平面的追刻龕存在两期，即明确了相对时间关系。由于第17窟明窗的第一期佛龕（左壁龕2）带有太和十三年纪年，可知第一期佛龕开始营造的时间不晚于太和十三年，第二期佛龕的雕刻应晚于太和十三年。具体时间需要通过佛龕的形制，即运用类型学加以探讨。

第一期佛龕主尊多为坐佛、交脚菩萨或二佛并坐，均施无畏印。胁侍菩萨或在龕内或在龕外，姿态多样。坐佛均为尖拱龕，交脚菩萨均为楣拱龕，但佛龕的装饰多样。第二期佛龕在造型上既有与第一期佛龕极为接近的，也有结构复杂的组合式佛龕。所以仅从佛龕的造型难以明确具体时间。一直以来佛像的着衣形式是一个较常用的时间判断标准。偏袒右肩及通肩等着衣方式要早于上衣搭肘、“褒衣博带”的汉式着衣。但第一期佛龕中已出现汉化样式的造像，这种样式在云冈石窟其他洞窟在相近时间亦有出现，如第11窟太和七年（公元483年）纪年龕旁的小龕、侧壁带有太和十三年纪年铭的第11—14龕等。因此仅通过佛龕内尊像的着衣亦无法判断两期佛龕的绝对年代。

部分追刻佛龕带有供养人，这些图像是造像活动参与人的自我表现。供养人有僧侣形象和世俗形象。僧侣形象供养人或合掌、或揣手或手持物，着衣在第一期小龕中多为覆肩袒右式，袈裟覆盖右肩之后，从右肘下方缠绕而出再搭至左臂。雕刻表现方式较为统一，线条简洁，袈裟边缘在胸前呈“V”形，被袈裟包裹住的手臂不表现上臂内侧的轮廓，身前以直线的形式表现从左臂垂下的袈裟（图一二）。而第二期小龕僧侣形象供养人的着衣则已汉化，变为上衣搭肘式，呈现汉服的广袖效果，并且细节各不相同（图一三，1—6）。整体上由于袈裟穿法的改变，身前从一道竖线，变为中间的弧线与两侧“广袖”呈现的斜线，并且可见双臂内侧的轮廓。仅一例衣纹细节无存，但也可看出较长的袖子及双臂的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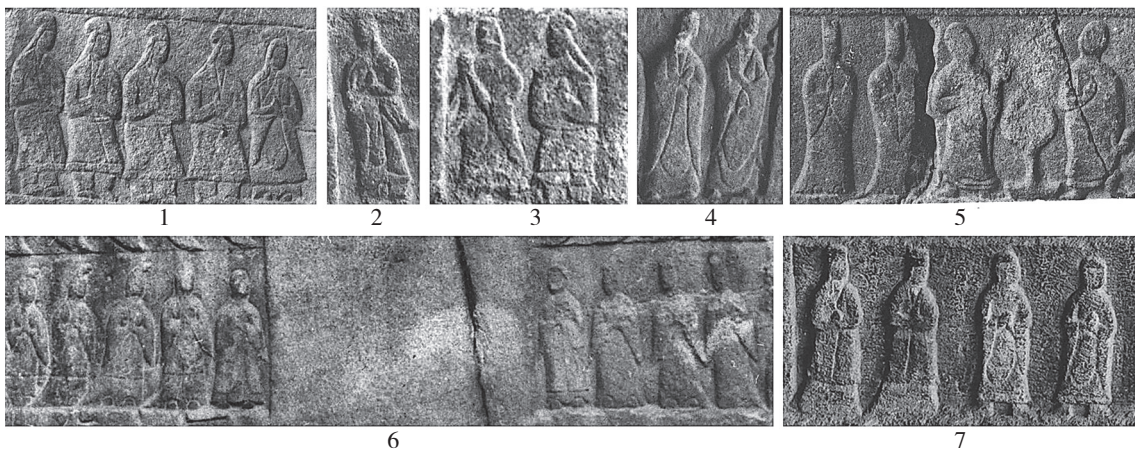
(见图一三, 5)。云冈石窟世俗供养人的着衣有胡服和汉服之分。胡服形象的男女均头戴风帽, 上身着交领窄袖长襦, 男性下身着裤, 女性着裙(见图一二-2—4, 图一三-1、3; 图一三, 7)。汉服形象的男性头戴小冠, 女性梳高髻, 均

衣交领大袖, 脚着履(见图一三, 5、6)。第一期追刻龕世俗供养人均着胡服, 第二期则有胡有汉(见附表)。从供养人组合来看, 第一期均为“覆肩袒右式僧衣僧侣+胡服供养人”。第二期小龕的供养人同时存在“汉式僧衣僧侣+



图一二 着覆肩袒右式僧衣僧侣与世俗供养人

1.第17窟明窗左壁龕2(太和十三年) 2.第16窟明窗左壁龕7 3.第17窟明窗左壁龕1 4.第18窟明窗右壁龕2
5.第18窟明窗左壁龕3a(1、3—5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pl.16、pl.12、pl.90、pl.84;2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一卷図版、pl.51)



图一三 着上衣搭肘式僧衣僧侣与世俗供养人

1.第18窟明窗右壁龕1 2.第19窟门口左壁龕5 3.第19窟门口左壁龕6 4.第19-1门口左壁龕1 5.第19-1门口右壁龕3 6.第19-2窟门口佛龕 7.第11窟明窗太和十九年龕(1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pl.89;2—6分别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三卷図版、pl.6、pl.6、pl.66、pl.67、pl.107;7引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八卷図版、pl.9)

胡服供养人”及“汉式僧衣僧侣+汉服供养人”的组合，与前者相同的组合方式见于第11窟明窗的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铭龕（见图一三，7）。

汉化是北魏太和年间的大趋势，与在一段时间中逐渐变化的主尊及世俗供养人着衣不同，在世俗供养人着衣尚不统一的第二期，僧侣的着衣已均变为汉式，这种突变显示出背后的强制力。与世俗之人不同，僧尼日常生活需要遵循严格的戒律，僧律在着衣方面从可穿着的衣物、长短至穿法均有明确要求。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戒律不完整，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并流行开来^[9]。北齐时期的最高僧官法上也曾统一僧服^[10]。此外，以唐代《道僧格》为范本的日本《僧尼令》也对僧尼的着衣进行了要求^[11]。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曾在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12]，虽然具体内容不明，但可能与僧侣形象供养人着衣的变化有关，故第二期佛龕的上限或可设为太和十七年。参考墓葬中的图像资料，北魏平城时期的汉人也广泛为胡服形象，汉服供养人的出现应与孝文帝的服制改革有关。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13]，云冈石窟在太和十九年仍可见到胡服供养人，如第11窟明窗的太和十九年龕。云冈石窟之外如邺城遗址出土太和十九年二月六日刘伯阳造像供养人身着胡服^[14]，龙门石窟古阳洞太和十九年十一月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的供养人也着胡服^[15]。胡服供养人在太和十九年之后已罕见，所以第二期佛龕的年代大致可以太和十九年为下限，即昙曜五窟整体雕刻千佛

的时期可能在太和十七年至太和十九年之间。

三、两项工程的性质

（一）窟前建筑

第14—20窟前利用洞窟外立面搭设梁架结构，营造出总长约120米、面阔22间的大型木构建筑，并架设瓦顶。昙曜五窟前出土的筒瓦和瓦当直径在20厘米左右，尺寸大于云冈石窟其他地点出土瓦件，与之尺寸相当的瓦件见于北魏平城内一处大型皇家建筑遗址——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16]。昙曜五窟窟前建筑所用瓦当未见使用云冈石窟其他建筑常见的“传祚无穷”等文字，而是使用了兽面纹。北魏时期瓦当装饰有着明显的变化，从文字变为兽面及莲花。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冬落成的明堂已普遍使用兽面纹瓦当。迁都洛阳后更以兽面纹及莲花纹瓦当为主，并且兽面纹瓦当仅见于太极殿遗址、阊阖门遗址、被推断为宗正寺或太庙一部分的一号房址^[17]、永宁寺遗址等宫城和内城中最为重要的皇家建筑，推断兽面纹仅限于在皇家高等级建筑中使用^[18]。所以第14—20窟的窟前建筑应为皇家工程。

窟前建筑与第一期小龕均早于千佛。明窗处的第一期小龕分布零散、位置不固定，但统一从靠近洞窟一侧开始营造。而窟前建筑相关槽孔是以窟外为起点展开，从规划的角度来看，第一期小龕与梁孔位置互不干扰。在高处雕刻时需要架设脚手架，比起为零星小龕架设10余米高的脚手架，利用窟前建筑施工的脚手架之便雕刻小龕更为合理。在昙曜五窟营造之初，皇家工程中就允许

个人或集团同步营造小龕^[19]。所以第一期小龕与窟前建筑同步营造的可能性极大，即窟前建筑的营造在太和十三年前后已经开始，在太和十七年已经完成。

（二）千佛工程

千佛龕营造于太和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正值迁都。太和十七年秋七月孝文帝南征，“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邺西；十有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20]；“（太和十七年冬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21]；至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22]。这一时期皇家营造活动的中心从平城开始经过邺城逐步转移至洛阳。

窟前建筑营造后，第18窟便成为跨越第14—20窟窟前建筑的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第18窟外壁门口右侧最下层保存一行体量较大的供养人像，目前尚存6人，由于风化具体形象难辨，但可观察到双脚可能是胡服男性的形象（图一四）。左侧对应位置岩体表层已完全剥落，供养人总数难以统计。这些供养人位于外壁最下层，应与千佛工程有关。云冈石窟的皇家工程不表现供养人，而集资窟龕则会表现出较多的供养人。供养人图像一般以主尊为中心左右

排列，男性在左侧，女性在右侧^[23]。第18窟右侧出现男性供养人形象，表明供养人应是一个男性造像集团，即千佛是集资营造。

第18窟主要造像以立佛为中心，胁以二菩萨、二立佛。与其他四窟不同，主尊周围雕刻出十大弟子及供养比丘的群像，主尊袈裟上雕刻出化生及化佛，表现了作为“宇宙主的释迦佛”，宣扬释迦佛的永恒^[24]。所以蔓延在整个云冈石窟西区东部的千佛很可能是第18窟世界观的延续。云冈石窟西区东部，通过营造窟前建筑化身而成一座新的佛殿，释迦佛放光化现的千佛，充满整个佛殿空间。在迁都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众、官僚或贵族通过集资的方式，装饰雄伟壮丽的新佛殿，以释迦佛的永恒，表达皇祚的无穷，是在“皇帝即如来”思想下北魏国家佛教信仰的实践。

四、结 语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后，在都城内建筑佛寺，设立僧官制度，令僧侣疏导民俗。此时，北魏佛教的基础之一，帝王即如来的思想已经奠定。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佛教进一步在北魏传播。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灭佛，繁荣发展的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文成帝复佛后，在当时最高僧官沙门统昙曜的发愿下，北魏皇家营造了第一所石窟寺院——武州山石窟寺。这个



图一四 第18窟外壁供养人（笔者拍摄）

寺院以容纳五尊巨大佛像的五个洞窟为标志。文成帝和平初年开始斩山开窟后，五个洞窟的营造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一般认为五窟之中第18—20窟先行完成，第16、17窟在文成帝时期并未完工，并且第16窟主尊完成已到孝文帝时期^[25]。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前后皇家又主导营造了横跨第14窟至第20窟的木构窟前建筑。通过考古发掘，窟前出土有草拌泥、彩绘泥墙皮等遗物^[26]，说明该窟前建筑并非仅是遮挡风雨的窟檐，而是有墙和门窗，具有殿堂式建筑的外观。巨大的佛殿比起仅有空洞的明窗和窟门的外壁面，更具视觉冲击力，突出了其皇家石窟的身份与等级。昙曜五窟窟前建筑的营造使五座独立的洞窟变为一个大型佛殿，印度传来的石窟与中国木构建筑有机结合，实现石窟结构上的突破，反映出孝文帝汉化改制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孝文帝对皇家石窟的改造，客观上推动了石窟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

皇家工程允许个人的参与，洞窟及主要造像开始营造时，帝王之外的出资人就同步营造了一批龕像，其中包括第17窟胁佛大龕、第19—2窟主尊等大型造像，可见昙曜五窟的营造原则是除象征五帝的五尊巨大佛像外的造像活动均可对外开放。窟前建筑营造时利用工程脚手架，又在洞窟明窗等处的空白壁面雕刻一些小型佛龕。建筑完成后，在迁都之际，帝王之外的信众集资营造千佛小龕，对窟前建筑包裹着的外壁面进行整体庄严。昙曜五窟作为帝王窟，仿佛佛教性质的宗庙。民众、官僚、贵族纷纷参与到这项大工程之中，是北魏国家佛教信仰下的具体实践。

注 释

- [1]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037页。
- [2] 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464—495页。
- [3] 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
- [4]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雲岡石窟 第二十卷 第十七窟—第四十一窟』本文、東京：科学出版社東京株式会社、2017年、第122頁。
- [5]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雲岡石窟 第二十卷 第十七窟—第四十一窟』本文、第139頁。
- [6] 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74—295页。
- [7]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十四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雲岡刊行會、1953—1954年。文中简称为《云冈石窟》。
- [8] 同[2]。
- [9] 《高僧传》载：“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参见慧皎：「高僧傳」、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年、第353頁。
- [10] 《续高僧传》载：“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参见道宣：「續高僧傳」、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卷、第485頁。
- [11] 《令集解》载：“凡僧尼、听着木兰、青碧、皂、黄、及坏色等衣、余色、及绛罗锦绮、并不得服用、违者各十日苦使、辄着俗衣者、百日苦使”。参见国书刊行会編：『令集解』卷七下、東京：国書刊行會、1912年、第247—248頁。

- [12]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第3039页。
- [13]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6页。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 [15] 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156。
-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 [18] 钱国祥、郭晓涛：《北魏洛阳城的瓦当及其他瓦件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
- [19] 熊坂聪美：《云冈石窟中小窟龕的展开》，黄盼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6—89页。
- [20]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3页。
- [21] 同[20]。
- [22]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8页。
- [23] 黄盼：《云冈石窟大型洞窟的营造背景》，《云冈研究》2023年第4期。
- [24] 宫治昭著、贺小平译：《宇宙主释迦佛——从印度到中亚、中国》，《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 [25]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26] 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二），第506页。

附表

昙曜五窟明窗、门口追刻龕统计表

窟号	位置	编号	龕形	主尊、手势	主尊着衣	供养人	分期
第16窟	明窗右壁	1	楣拱龕（上）、尖拱龕（下）	交脚菩萨（上）、坐佛（下），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袒右	铭区被追刻千佛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右壁	2	楣拱龕	交脚菩萨，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无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1	尖拱龕	坐佛，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2	尖拱龕	二佛并坐，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3	尖拱龕	坐佛，风化	风化	无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4	楣拱龕	交脚菩萨，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铭区被追刻千佛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5	楣拱龕	交脚菩萨，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无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6	尖拱龕	坐佛，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细节不明+胡服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7	尖拱龕	二佛并坐，施无畏印	袒右	僧侣+世俗，覆肩袒右+胡服	第一期
第16窟	明窗左壁	8	圆拱龕	二佛并坐，禅定印	通肩	无	第二期
第17窟	明窗右壁	1	风化	交脚菩萨，风化	斜披络腋	风化	第一期
第17窟	明窗右壁	2	尖拱龕	坐佛，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7窟	明窗左壁	1	楣拱龕	交脚菩萨，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僧侣+世俗，覆肩袒右+胡服	第一期

续附表

窟号	位置	编号	龕形	主尊、手势	主尊着衣	供养人	分期
第17窟	明窗左壁	2	楣拱龕 (上)、尖拱龕 (下)	交脚菩萨(上)、二佛并坐(下), 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袒右	僧侣、覆肩袒右	第一期 (太和十三年)
第18窟	明窗右壁	1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 上衣搭肘+胡服	第二期
第18窟	明窗右壁	2	尖拱龕	坐佛, 施无畏印	袒右	僧侣+世俗, 覆肩袒右+胡服	第一期
第18窟	明窗右壁	3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无铭区	第二期
第18窟	明窗左壁	1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无	第一期
第18窟	明窗左壁	2	楣拱龕	游戏坐菩萨, 施无畏印	交叉披帛	无	第一期
第18窟	明窗左壁	3a	楣拱龕	交脚菩萨, 施无畏印	交叉披帛	僧侣+世俗, 覆肩袒右+胡服	第一期
第18窟	明窗左壁	3b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 覆肩袒右+胡服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1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残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2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3a	楣拱龕	交脚, 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3b	尖拱龕	二佛, 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4a	楣拱龕	交脚, 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4b	尖拱龕	二佛, 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5	尖拱龕	坐佛,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无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6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无铭区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右壁	7	尖拱龕	坐佛, 风化	上衣搭肘	无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1	楣拱龕	交脚菩萨, 施无畏印	斜披络腋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2	尖拱龕	二佛并坐, 施无畏印	袒右	无	第一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3	尖拱龕	坐佛, 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无铭区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4	尖拱龕	坐佛, 禅定印	通肩	僧侣+世俗, 细节不明+胡服	第二期

续附表

窟号	位置	编号	龕形	主尊、手势	主尊着衣	供养人	分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5	尖拱龕	二佛并坐，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上衣搭肘+胡服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6	尖拱龕	坐佛，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上衣搭肘+胡服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7	楣拱龕	交脚菩萨，残	交叉披帛	崩塌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8	圆拱龕	坐佛，禅定印	通肩	无存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9	尖拱龕	坐佛，施无畏印	上衣搭肘	风化	第二期
第19窟	门口左壁	10	尖拱龕	坐佛，禅定印	通肩	难以辨认	第二期
第19-1窟	门口左壁	1	复合龕	交脚菩萨、坐佛、倚坐佛、立佛	交叉披帛、上衣搭肘	僧侣，上衣搭肘	第二期
第19-1窟	门口左壁	2	楣拱龕（上）、尖拱龕（下）	交脚菩萨（上）、坐佛（下），施无畏印	交叉披帛、上衣搭肘	世俗，胡服	第二期
第19-1窟	门口右壁	3	复合龕	交脚菩萨、坐佛、倚坐佛、立佛	交叉披帛、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上衣搭肘+汉服	第二期
第19-2窟	门口左壁	无	复合龕	交脚菩萨、坐佛、倚坐佛、立佛	交叉披帛、上衣搭肘	僧侣+世俗，上衣搭肘+汉服	第二期

(责任编辑 李学来)

○信息与交流

《奉节永安镇墓群》简介

《奉节永安镇墓群》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科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586页，字数约145.4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136页，定价546元（全二册）。

在奉节永安镇墓群共清理战国、汉代、蜀汉两晋和唐代等时期的墓葬105座，以汉代墓葬数量最多，战国时期墓葬次之，蜀汉两晋时期和唐代墓葬较少。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少数为

砖室墓、石室墓和土洞墓。在这批墓葬中，以战国时期的墓葬最具特色，其中的M99是三峡地区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战国墓葬，随葬器物精美珍贵、丰富多样，绝大部分为青铜器，还有包金铜节约、镂空铜熏杯等较罕见的高等级随葬品。这批战国墓葬具有显著的巴、楚二元文化特征，是巴楚文化融合的重要代表，对于三峡地区战国墓葬及巴楚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雨 珩)